

国家图书馆藏明清刊本《左传》题跋辑释*

梁葆莉

《左传》是中国古代要籍之一,历代有很多相关著作刊刻行世,载于其上的手书题跋,颇具学术价值:第一,有些题跋涉及到《左传》的内容、艺术形式等多方面的信息,识见亦高,成为《左传》研究的珍贵资料;第二,有些题跋记录了《左传》类善本的递藏信息,为其版本源流研究提供重要线索;第三,这些题跋大多为清代以来著名藏书家所写,是深入研究藏书家的第一手资料。国家图书馆藏宋元版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上的题跋,李致忠先生《宋版书叙录》已予收录。兹对国家图书馆藏明清刊本《左传》类善本题跋进行辑录、考释,冀有裨于学术研究。

一、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,晋杜预撰,唐陆德明释文,明刻本,
清朱邦衡校并跋又录惠栋校 索书号 3802

北宋本《正义》三十六卷,经、传、《正义》都计壹佰肆仟伍佰叁拾字。

假钱氏景开所得南宋本,略校一过,南宋本误处甚多,其岳本是而南宋本实误者,皆去而不录,疑似参半者以朱别之,释文乃宋本所无,故亦缺如。甲辰三月廿三日校毕志。秋崖邦衡。

合唐石经及淳化本《正义》、陆氏《释文》、许氏《说文》、《六经正误》、康成所引《左传汇释》,参校南宋本《正义》,校数卷三十,匝月而毕,松崖惠栋。乾隆戊申三月下泮门人朱邦衡校正。(卷三十末下钤朱文方印“秋崖”)

此书另钤印:“敬輿”(白方)、“秋崖居士”(白方)、“滋兰堂藏书记”(朱方)等。“敬輿”、“秋崖居士”为朱邦衡藏书印。朱邦衡追随吴派汉学的核心人物惠栋,曾传录《国语》惠栋校本,于此书中手录惠栋校语,承传惠氏之学。余萧客(1732-1778)曾以《注雅别钞》就正于惠栋,遂执弟子礼,惠栋歿后,世欲传惠氏学者,多从余氏游。滋兰堂是朱邦衡侄朱奂藏书处,朱奂精版

*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“大陆藏汉文古籍藏书题跋整理与研究”(10ATQ005)成果之一。

本、目录之学。

跋中《正义》即孔疏。北宋时期,经注与孔疏并未合刻^①。北京图书馆藏有南宋绍熙三年(1192年)两浙东路茶盐司刊刻的《礼记正义》,书末有茶盐司提举黄唐跋语,得知南宋始有注疏合刻本^②,确切地说,《左传》经注与疏合刻始于南宋庆元六年的绍兴府刻本^③。由此可知,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的北宋本经注与疏并未合刻,南宋本则合而为一。

岳本即元初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。每半叶8行,行17字,注文双行,行字同。细黑口,四周双边。不避宋讳,写刻俱精。元初岳氏荆溪家塾据廖莹中世彩堂本校正重刻,南宋私家刻书,廖莹中以精美,为诸家之冠。“其后开《九经》,凡用十馀本对定。各委本经人点对,又圈句读,极其精妙。”^④岳本由此而来,足资校对。

钱氏景开即钱听默,号景开、景凯,乾嘉时书贾。洪亮吉在《北江诗话》中谈及不同类型的藏书家时,将钱听默归为掠贩家^⑤,有鄙薄之意。其实,钱听默并非空疏之辈,“能诗,善鉴宋元板刻并法帖书画”^⑥。顾千里曾谓:常熟钱遵王、毛晋父子等家藏书散出后,“乾隆年间滋兰堂主人朱文游三丈、白堤老书贾钱听默皆甚重常熟派,能视装钉签题根脚上字,便晓属某家人之物矣。余喜从两人问各家遗事颇悉”^⑦。另外,钱听默校《说文》、《河南邵氏闻见录》等,抄《徐公文集》、《玉壶清话》等,并有诗集《梦云小稿》。可见,钱听默赏鉴功力与才情拔于流俗,非寻常书商可比,颇受当时宿学藏家青睐,吴騫拟之为宋之陈起,黄丕烈称之为“书友中巨擘”,朱邦衡从其手中借得南宋本校勘,便不足为奇。

二、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,晋杜预撰,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,蜀冯继先撰, 明刻本,清黄廷鉴跋,索书号 3287

此宋刻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三十卷,前有《春秋名号归一图》一卷,即《石经提要》所引南宋巾箱本,阮氏《校勘记》所载淳熙小字本也。《校勘记》历叙是书旧本,北宋刻有二,而皆残卷,其完善无阙者,首列是书,其为世珍,足可知已。书中《庄六》“后君噬齐”作“噬脐”;《僖廿三》“怀与安”作“怀其安”;《宣十二》“楚军讨郑”,“军”作“君”;“屈荡尸之”,

①顾广圻:《百宋一廛赋》,《顾千里集》,中华书局,2007年,第4页。

②郑玄注、孔颖达正义《礼记正义》,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绍熙三年(1192年)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刻本。

③张金吾: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卷五,清光绪十三年刻本。

④周密:《志雅堂杂抄》卷下,《笔记小说大观》,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,1983年。

⑤洪亮吉:《北江诗话》卷三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3年,第46页。

⑥严元照:《书春秋经传集解宋刻残本后》,《悔庵学文》卷六,光绪五年湖州义塾刻湖州丛书本。

⑦顾千里:《题清河书画舫》,《思适斋书跋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,第63-64页。

“尸”作“户”；《襄廿八》“武王有乱臣十人”，无“臣”字；《昭八》“臣必致死以息楚”，“楚”下有“国”字；《定八》“晋师将盟卫侯于鄆泽”；“鄆”作“剌”，皆足正明监本及坊本之失，间有俗体讹字，无伤大指，阮氏定为宋刻中善本，有以也。子雍明经于去冬以厚价购得是本，出以示余，从此书库中缥緗益生色矣。宋槧经籍，传世日少，余耄矣，犹幸获拭目展审一过，洵于翰墨缘中不浅也，读竟，为识数语于后。道光庚子秋九月下瀚，七十九叟黄廷鉴书。^①

据黄国光《铁琴铜剑楼藏书活动系年述要》（上），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庚子，10月16日至10月24日间（九月下旬），黄廷鉴读竟此书并题跋^②。黄廷鉴跋语误断此书为宋本，虽收入《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》，惜瞿氏未作辨析，故有必要略作考释。

《石经提要》即《石经考文提要》，彭元瑞撰，傅增湘《乾隆石经考文提要书后》：“五十九年夏，高宗幸避暑山庄，文勤以校正石经事未随扈，命每时晨携笔砚入乾清宫，金勤恪简为之备食，于是文勤得尽观天禄琳琅所藏宋元槧各经，多人间未见之本，与监本、坊本考其同异，著为一书，名曰《乾隆石经考文提要》，凡衡书不合于古俱改正之。”^③甘鹏云《石经考文提要书后》：“将天禄琳琅所藏宋槧各经本，与监本坊本，校勘异同，于石经内，改从宋本，文勤于是有《考文提要》之作。”^④彭元瑞得观天禄琳琅所藏珍罕异本，校勘异同，因此，《石经提要》所载的版本信息颇为重要。《石经提要》屡屡引用淳熙三年阮氏种德堂刻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，定为南宋巾箱本。黄廷鉴跋中则径引阮元“淳熙小字本”的说法，到底确否，值得考究。

嘉庆二十年（1815），阮元主持刊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，《左传注疏校勘记序》列举校勘所引书目，其中有“淳熙小字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三十卷”，阮氏注云：“每半页十行，行十八字，注文双行，行廿二字，附释音。此宋时坊刻，有讹字俗体，大致不失其为善本。卷末题‘淳熙柔兆涪滩中夏初吉闽山阮仲猷种德堂刊’，柔兆涪滩乃宋孝宗淳熙三年丙申也，末附《春秋名号归一图》二卷，蜀冯继先所作。”^⑤阮元见到的是小字本，于是，自阮元起，淳熙三年种德堂本被当作小字本。阮元《校勘记》影响着实不小，黄廷鉴依据阮元《校勘记》的说法，将铁琴铜剑楼收藏的这本书定为宋刻淳熙小字本。瞿镛编纂的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亦标明此书为宋刊本，录卷末墨围识语：“谨依监本，写作大字，附以释文，三复校正刊行，如履通衢，了亡室（疑‘室’之误。）碍处，诚可嘉矣。……

①瞿良士：《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13页。

②黄国光：《铁琴铜剑楼藏书活动系年述要》（上），《文献》1999年第3期。

③傅增湘：《藏园群书题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44页。

④英和：《恩福堂笔记》卷七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。

⑤阮元：《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序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。

淳熙柔兆涪滩中夏初吉,闽山阮仲猷种德堂刊。”^①并加案语:“柔兆涪滩為丙申,乃宋孝宗淳熙三年也。与阮氏《校勘記》所载淳熙小字正同……是本佳处,黄琴六廷鉴尝为之跋……阮氏定为宋刻善本,有以也。”^②瞿镛认为自家所藏为阮元所说的淳熙小字本。杨守敬亦沿用阮元之说,光绪六年至光绪十年(1880-1884年),杨守敬在居日期间编撰《留真谱》,收录宋淳熙种德堂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,摹刻牌记:“谨依监本写作大字附以释文三复校正刊行如履通衢了亡室处……清监淳熙柔兆涪滩中夏初吉闽山阮仲猷种德堂刊。”^③并加案语:“此即阮氏校刊所称淳熙小字本也。”^④

近几十年,专家鉴定此书当为明翻宋刻,陈先行先生的看法最有代表性:“宋淳熙三年种德堂所刻乃大字本,小字本当为后来翻刻……《留真谱》所据之底本也不是种德堂大字本。牌记文字与版本实际情况不符合,主要是受阮氏‘淳熙小字本’的影响。……宋淳熙三年种德堂所刻乃大字本,小字本当为后来翻刻,而从版刻风格看,翻刻时间应在明代中期。”^⑤此观点基本得到学界公认。黄廷鉴跋误将此书定为宋淳熙小字本,主要是因为明中期仿宋之风兴起,出现了许多翻宋精品,增加辨别版本的难度。

三、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,晋杜预撰,唐陆德明释文, 明刻本(卷六、二十六配清抄本),许瀚跋,索书号 849

此刻向见二本,皆有明人补刻处,凡补率多讹误。此本有缺叶无补叶,盖印在未补前,可珍已。瀚所藏乃明初覆本,刻者署“书林宗文堂乐斋郑希善”,其年则丙戌,惜被书贾挖去“丙戌”上二字,补以“至元”以充元槧,遂无由知其年号。取校此本,纤毫毕符,其附《释文》或间以圈,或字外加□,或标以黑地白文。淳熙原刻本不画一,兹钞各叶,酌以朱字代其白文,其有显谬,别以朱字记诸眉端,恐系覆刻之误,非宋本真面也。

许瀚勤于训诂、校勘,精审不让顾、黄。此跋重在辨版本。此本有刻书牌记“书林宗文堂乐斋郑希善”,书林宗文堂乃元明两朝福建建安刻书世家郑氏所营,自元至明,刻书颇多。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“元时书坊刻书之盛”条中,确定元时宗文堂刻有《春秋经传集解》三十卷。其实,之前森立之早已将此书定为明覆宋刻,他在《经籍访古志》中说:“青归书屋所藏明刊本即覆刻此本者(注:此本指宋淳熙阮氏种德堂本),卷末木记亦全同,但淳熙以下十九字改作

①瞿镛编纂、瞿果行标点、瞿凤起覆校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0年,第96页。

②瞿镛编纂、瞿果行标点、瞿凤起覆校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,第96-97页。

③杨守敬《留真谱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4年,第114页。

④杨守敬《留真谱》,第114页。

⑤陈先行:《宋版之魅力》,《收藏家》2008年第12期。

‘□□丙戌孟冬之吉书林宗文堂乐斋郑希善刊已’。”^①宗文堂为元时郑天泽所创,故元代刻书多署“郑天泽”,明代多署“郑希善”,绵延 200 多年^②。可见,叶德辉定为元本不妥。许翰依牌记和内容,通过校勘,判定刊刻时间,确实可信。

四、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,晋杜预撰,唐陆德明释文,明刻本, 存十五卷 一至十五,傅增湘校并跋,索书号 11

癸酉二月十三日依抚州本校定,凡改正十二字。藏园雪窗记。(卷一末)

癸酉二月二十日依抚州本校定,改订十有二字。藏园傅增湘记。(卷二末)

上跋中所谓抚州本,即宋抚州公使库刻本的第一、二两卷,钤有“白拙居士”和“潘耒私印”两枚白文印,曾入天禄琳琅,定为真宋监本,1933 年,傅增湘从东华门外收得这两卷,定为抚州公使库本,李盛铎认同^③。抚州本为宋刻精品,故可依据校定此明本。

五、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,晋杜预撰,唐陆德明释文,明刻本, 钱陆灿批,李葆恂跋并录李兆洛题识,索书号 7935

余读《左氏传》,谓其文前后非一手,又谓其序事不尽与《经》、《传》相傅,然同余论者颇少。此吾乡湘灵先生评本,薛画水以赠康竹吾者,喜其持论之多与予意合,故属守之仿录而存之。其所论未必尽当,要之,读书者不可不存此眼,左氏且然,余书抑可知,能推此法,则读破万卷书不难矣。此是求其心之事,然无疑非求新异也,守之故能读若解,从此反隅于学,其庶几乎?嘉庆二十三年四月圈识毕,持以请益,故为书其卷端。

此跋是李葆恂录李兆洛跋。李兆洛(1769-1841)深研文章之道,认为《左传》内容前后非一人所作。李兆洛所谓湘灵先生,即钱陆灿(1612-1289),字尔弢,号湘灵,因晚年寓居武进,故李兆洛称之为“吾乡”。钱陆灿学诗、学佛,并学古文于顾大韶,其评《左传》,当非偶然。

上跋后有李葆恂墨跋:

右武进李申耆先生所作副本跋,予从集中见之,具录于此。画水先生名玉堂,与吴仲伦先生善,有《七家文钞》行世。守之名尚玺,先生高足弟子、完白山人之子也。竹吾名兆奎,兰皋中丞之子,亦先生弟子,其弟名兆晋,字康侯,则仲伦先生弟子也。中丞曾受(?)业姚姬传先生之门,父子并

①森立之:《经籍访古志》,卷二,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》第 19 册,中华书局,2006 年,第 330 页。

②谢水顺、李珽:《福建古代刻书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,1997 年,第 199-200 页。

③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题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 年,第 24-26 页。

得名师,故言山右文学者,推与称康氏焉。康侯先生之子名曾定,字麦生,以县令需次河南,先大夫抚中州时,属以章奏,一时府中宾僚称盛,名声皆出君下。余学治古文辞,得君之指授为多,后权知备武职事,濒行,语余曰:“余有钱湘灵先生手评《左氏传》,为世父竹吾公所赐,君家申耆先生曾录副以教学者,为治古文辞者不可不读书。余老矣,异日当奉以赠子,此书早得所归矣。子其珍之。”余谨识之,弗敢忘,未几,君遽归道山。今年正月,君嗣鲁门孝廉始出以见遗。余即□君之不及见,而孝廉之善承先志,不可以勿识也,遂录申耆跋语于右,以见此书之可宝,并记其流传之绪如此,盖悲喜交至矣。我子孙得有此书者,其永宝藏之,勿轻以借人也。光绪辛卯正月初十日,义州李葆恂文石甫识于大梁。

薛画水,名玉堂,字又洲,号画水,无锡人。嘉庆十二年(1807)十二月,薛玉堂赴庐州府同知任,时任安徽凤台知县的李兆洛为其下属,薛画水嗜好古文,自然与李兆洛同气相投,李兆洛有《薛画水文钞序》以及《薛画水携杖山行小照》、《简薛画水即留别》等诗作,记述二人相交之情。薛画水作品有《薛画水文钞》、《诗钞》、《四书便钞》、《词》等,此处独言薛画水的《七家文钞》,旨在突出古文是薛画水与桐城古文的核心人物李兆洛交往之纽带。

薛画水何以与吴仲伦善?一因书法,薛玉堂工于书法,而同属常州府的同乡吴仲伦(德旋)于书坛亦颇有声名,志趣相投,相互友善便合乎情理;二因古文,吴仲伦在当时亦有文名,“当嘉、道间,传古文法者,有宜兴吴德旋、上元梅曾亮诸人,曾亮自有传。德旋,字仲伦。诸生。以古文鸣。与阳湖恽敬、永福吕璜以文相砥砺。诗亦高澹绝俗,有《初月楼集》”^①。吴仲伦传古文法,且其身边有恽敬等古文家,薛画水与此群体以文砥砺。

完白山人即邓石如,与桐城派古文大家姚鼐相知甚深,守之即其子,“子传密,初名尚玺,字守之。从李兆洛学,晚客曾国藩幕。能以篆书世其家”。父交姚鼐、子师兆洛,足见邓石如父子与古文家过从甚密。

兰皋中丞即康绍镛,字兰皋,山西兴县人,嘉庆四年进士。嘉庆二十四年,调广东巡抚,故称“康中丞”。高承钰为李兆洛《端溪砚坑记》一文题识云:“嘉庆庚辰(1820)先生游粤东,馆于康兰皋中丞所,越二年乃归,此稿作于是时。”^②李兆洛游粤东时,与康绍镛来往厚密,并为康绍镛校刻姚鼐的《古文辞类纂》,李、康二人同好古文,同气相求。李兆洛坐馆康府,康绍镛之子康竹吾从之学,《古文辞类纂后序》中提及父子二人与李兆洛俱好古文之事:“余抚粤东之明年,儿子兆奎师阳湖李君兆洛申耆来,语次及桐城姚姬传先生《古文辞类纂》一书在其家。余尝受学于先生,凡语弟子,未尝不以此书;非有疾病,未尝不订此书,盖先生之于是,亦勤矣。”^③李兆洛的《与康竹吾书》,写于康竹吾以

①赵尔巽、柯劭忞等: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五,中华书局,1977年,第13397页。

②李兆洛:《端溪砚坑记》,金武祥《粟香室丛书》本。

③康绍镛:《古文辞类纂后序》,张启蕴《(光绪)兴县续志》,清光绪六年刻本,卷下。

道员引见并别有除授之时,信中谈论进退、畅叙读书,情深意笃。《与康竹吾主客图记》记述康竹吾暂居扬州时与当地文人诗酒唱和的情景,潇洒超脱、风神毕现。

康绍镛还有一子康兆晋,字康侯,从学于吴德旋。吴德旋《初月楼论书随笔》:“道光辛卯,在四明馆中理旧篋,得门人康侯为予所录本,复自书一过。”康兆晋编辑并刊刻吴德旋《初月楼闻见录》十卷、《续录》十卷,确为吴氏得意门生。由此可见,康绍镛本人及二子均与当时古文名家李兆洛、吴德旋颇有交往。上跋中“父子俱得名师”,诚此之谓也。

不但如此,康绍镛的孙辈亦与桐城古文家关系甚密。“康曾定,字少侯,号麦生,兴县人,道光己酉拔贡,河南候补知县。《诗话》‘麦生以诗古文名家,久居李子和尚书幕府,数权大县,有政声,遗集无闻,惜哉!’”^①。康曾定继承先志,担荷着康氏三代人的期望,终以古文名家。李葆恂此跋记录康曾定调任前仍不忘教授古文之道的谆谆话语,情深意切,令人动容。康氏第四代、康曾定之子鲁门孝廉,亦不忘先人传习古文之志。

此书终归李葆恂处。李葆恂依然保留着对古文足够的尊重与热爱,以及身体力行学习与传承的习惯。通过上述考释可看出,收藏家与桐城派学者之间错综密切的关系,师徒相授,父子、兄弟并从名师,互相砥励,绵延学风。

六、古文春秋左传十二卷,汉贾逵、服虔等撰,题宋王应麟辑, 清抄本,王大隆跋,索书号 3743

此宋王伯厚辑《春秋左传古注》及《论语郑注》,皆吾吴惠定宇征君所托名者也。前人虽有知之,而不能甚悉,故袁陶轩于《论语》又疑为出于严厚民,惟劳季言决其为惠氏辑本,并言鲍以文曾有刻本。今未见《春秋》,则余昔于亡友丁君初我处见原稿本,想即此本之所自出也。顷以严豹人辑《左传注》、宋于廷辑《论语注》与此本比勘,大致皆无异。严、宋二家序中皆不言有惠氏书,二人素称藏书家,又为同郡后学,于惠辑本不但未见,且又未知也,岂以托名伯厚,故遂无注意及之者耶?尝思惠氏托名伯厚之故,其以伯厚辑有《郑氏易》、《三家诗》,故托以为重耶?以惠氏之笃古,似不宜出此。或本非定本,未经付刊,偶题古人之名,而后之传钞者遂亦仍而未改与?固与有心作伪者有异矣,且较攘窃他人著述而自名者何如也。余服膺惠氏之学,近辑《松崖读书记》,观书于瞿氏铁琴铜剑楼,凤起吾兄出此见示,以余审知其详,属为跋尾,遂书臆见于此,乙亥三月十一日王大隆记。

此书卷一题下、卷十二末均钤有“铁琴铜剑楼”白文长印一枚,可见为瞿氏家藏。王大隆因辑《松崖读书记》之需,乙亥年(1935)观书于铁琴铜剑楼,

^①徐世昌编、闻石点校:《晚晴簃诗汇》卷一五〇,中华书局,1990年,第6534页。

瞿凤起以家藏《古文春秋左传》见示,以王大隆详知此书渊源,故嘱其题跋。王大隆服膺惠栋之学,并非虚言。1942年二月廿九日,王欣夫欲请郭则沅为自己的《抱蜀庐校书图》题词,致郭函曰:“素治校讎之学,服膺惠定宇、钱竹汀、王石瞿、顾涧蓑四先生,既成《松崖读书记》、《思适斋遗书》,本师曹叔彦先生已序之矣。近倩友人为作《抱蜀庐校书图》,以志微尚,仅具素笺,求赐题咏,以光卷帙,不胜大幸。”^①函中重在求题咏,故所及己之学术旨趣实在无需矫饰,当为可信。《松崖读书记》今存二卷,藏复旦大学图书馆。

跋中所及的《论语注》,即《论语郑康成注》二卷,郑玄撰,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为十卷,后不见于志目,当亡佚。跋中“袁陶轩《论语》”即袁陶轩所辑《论语注》十卷,收入《郑氏佚书》,今有浙江书局本。劳季言辑有《论语郑注》一卷,《月河精舍丛钞·读书杂识》收入。劳氏所谓鲍以文刻本,指嘉庆鲍氏知不足斋刻《古文论语》二卷,陈鱣、吴騫校补并丁杰补,《碧琳琅馆丛书》、《芋园丛书》均收入。王大隆此跋着重辨析《古文春秋左传》辑者,并主惠栋所辑的观点。他将严蔚(豹人)所辑《春秋内传古注辑存》,与此书对比,发现大致无异;他又将宋于廷所辑的《论语注》与题王应麟辑的《论语郑康成注》相比,亦大体相同。由于劳格断言《论语郑注》虽题为王应麟辑,实乃惠栋所辑。王大隆据此推断《古文春秋左传》亦属此种情况,题为王应麟辑,亦实为惠栋辑。王大隆此跋中认为造成将惠栋之作署为王应麟的原因是,惠栋著作未经付刊时,偶题古人之名,后来传钞者沿用未改,遂致误将此书辑者传为王应麟。

王大隆从丁初我处所见原稿本,即稿本《古文春秋左传》,现藏于上海图书馆。是书无框格,每半叶十一行,行二十四字。书签铃印“淑照堂丁氏藏”,卷端初题“春秋左传集注”,后改题为“古文春秋左传汉学”,又涂乙“汉学”二字,铃印“虞山李氏”。此稿本潘景郑曾藏,他说:“此书及《补注》稿本,俱为故入丁初园先生旧藏。此本有‘虞山李氏’藏印,初园先生盖得诸乡里者。此书几经流徙,幸不出闾阎间,乡贤遗泽,吉光片羽,可不实诸!”^②

国图另藏一种《古文春秋左传》,题为清惠栋辑,陈鱣、吴騫、吴昂驹校补,亦为十二卷,二册,九行十九字无格。内容与此书大同小异。书前有序。序中明确指出惠栋是真正的辑者:“此亦惠定宇所辑,不出王厚斋手。丙申春传写程渔门本,庚子夏粗阅一过,其秋九月钱可庐手辑本互校(初七上册校毕,十五下册校毕)。”^③此序未署名,不知何人所作。序中虽已指明此书是惠栋所辑,但该书卷二、卷九等多处注明“浚仪王应麟撰集”,可见,这三位乾嘉时期的藏书家仍然认为王应麟是真正的辑者。将此书的序与三位乾嘉学者的校语结合起来,实

^①见徐俊:《王欣夫先生手札读记》,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yangzyxinju>, 2011-11-13。

^②潘景郑:《著砚楼书跋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年,第7页。

^③贾逵、服虔等:《古文春秋左传·序》,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。

际上间接提出了《古文春秋左传》由王应麟辑、惠栋补辑的观点。

七、春秋左传补注六卷,清惠栋撰,清乾隆三十七年胡亦常刻、三十八年张锦芳续刻本,王萱龄录春秋内传古注辑存并跋,索书号 16914

惠定宇先生《九经古义》刊于常熟,蒋氏所刊多有,唯《左传补注》至为难得。乙亥冬,铃庵师授余是本,癸未冬,又以严豹人《春秋内传古注辑存》录于书首。

跋中所言惠氏《九经古义》蒋氏刊本,即常熟蒋光弼省吾堂刻本。此书卷一、卷二、卷三末署“益都李文藻覆校”,有牌记“潮阳县衙钐版”,应是李文藻为潮阳县令时所刻,流行并不广泛,故跋中言“至为难得”。李文藻与此书颇有缘。五月至十一月,李文藻以谒选居京师,期间多次至纪昀家中,并为之检曝书籍,故得见惠定宇经义底稿《周易述》、《易汉学》、《周易本义辨证》、《左传补注》、《古文尚书考》等数种。

跋中所及铃庵即洪莹,淹通经史,于五经皆有撰述,并见《汉学师承记》^①。跋中所说录于书首的《春秋内传古注辑存》,即在此书卷首天头处,署“东吴严蔚豹人”,前有王鸣盛序,落款“丁未仲春西庄老史王鸣盛题,时年六十有六”。序后接《例言》,次录正文。王鸣盛从“惠栋问经义,遂通汉学”,为乾嘉时期吴派汉学的主要力量,他说:“门人严蔚豹人采集《春秋内传古注辑存》三卷,所采家数自服虔、贾逵、刘歆以下,约如千家,豹人知有遗漏,实能补之,诚为有功。”^②自是知言。《春秋内传古注辑存》有乾隆二酉斋刻本,三卷,北京大学图书馆存臧庸校本。“分隐、桓、庄、闵、僖为上册,文、宣、成、襄为中册,昭、定、哀为下册。……卷首有自撰例言及乾隆丁未卢抱经文昭、王西沚鸣盛、钱竹汀大昕三序”^③。

此书另铃有朱文方印“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”和朱文长印“长乐郑氏藏书之印”,可见经郑振铎收藏。

八、春秋左氏传补注十二卷,清沈钦韩撰,清同治十二年刘履芬抄本,刘履芬跋,索书号 14716

同治癸酉闰六月录始,七月二十四日工竣。是书稿本存吴冯中允桂芬家。江山刘履芬记于江苏书局。

沈钦韩,嘉庆间举人,肆力于左氏之学。此书自作序曰:“奈何杜预以罔利之徒,懵不知礼文者,蹶然为之解,俨然行于世,害人心,灭天理,为左氏之巨蠹,后生曾不之察,腾杜预之义,而播左氏之疵,左氏宁受焉?亦见其粗中薄植,

①石国柱:《(民国)歙县志》卷七,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。

②王鸣盛:《蛾术编》卷二《说录》二,清道光二十一年世楷堂刻本。

③周中孚:《郑堂读书记》卷十一《经部》六之下,民国吴兴丛书本。

一魏晋之妄人，莫觉莫悟，何有于古学哉？区区之衷，久怀愤懣，遂补注十二卷，发明婉约之旨，逐条纠驳，各见于卷，则左氏之沉冤稍白，杜预之丑状悉彰，其么麽蠢类，横螻左氏，殆不足辨，不悉著。”^①杜预《集解》在春秋学史上地位甚为重要，沈钦韩如此不屑，显为个人狭隘刻急之意气使然，然沈钦韩矻矻穷年以期有所建树的焦灼感亦可体会。

刘履芬藏书宏富且勤于抄录。叶裕仁《刘泖生莎厅课经第二图后序》：“江山刘泖生刺史，性嗜书，遇善本必倾囊购之，其不能得者，手自钞录，日课书十纸，终日伏案矻矻，未尝见其释卷以嬉也。”^②抄写此书即其一例。刘履芬身后，书散出，归章钰，故此跋后有朱文长印“长洲章氏四当斋珍藏书籍记”。跋中言此书有稿本存冯桂芬家，冯桂芬之文才、政见颇得李鸿章欣赏，曾主讲金陵、上海、苏州诸书院，与后进论学，朝夕不辍。

九、左氏古义六卷，臧寿恭撰，清劳氏丹铅精舍抄本， 清劳格校并跋，索书号 10985

《左氏古义》六卷，长兴臧晋卿先生（寿恭）著，前从乌程周莲伯孝廉（学濂）借录，咸丰己未七月十日戊寅校阅一过。劳格记。

段大令（玉裁）《春秋左氏古经》，每条时出订正之语，有可补此书之漏略及互相证明者，录于卷端。丹铅生又记。

著者臧寿恭，好读书，尤精小学，且“肆力于经籍，得原本《北堂书钞》手自校录，传写古本书十数种，端楷细书，有沈麟士风”^③。此书采摭以刘歆、贾逵、服虔三家为主的汉人佚说，多附案语。潘祖荫评曰：“其体例简质，亦得古注家之法，后之考左氏经者，当有取于斯焉。”^④

此书另有朱文方印“盐山刘千里藏书”、白文长印“韶印斋”、朱文长印“北皮亭刘氏所藏秘籍”、白文方印“刘印驹贤”、朱文方印“千里”，此乃民国藏书家刘千里收藏。书中另有朱文方印“元方审定”，又经赵鋈收藏。

十、左氏条贯十八卷，清曹基撰，清刻本，丁晏批注并跋，索书号 12035

此书分国系年，颇有条理，惜乎事实始末，不能完具，颇多遗略。盖事有见于经者，必当编入。此乃专据传文也，余不能分明矣。小国如滕、薛、杞、莒皆略之，而梁与潞事迹寥寥，反刊于国之图册，予之陋如此。丙辰冬十二月丁晏记。

丁晏道光举人，兼收汉学、宋学两家之长而不偏废，他治学求精，治一书

①丁晏：《春秋杜解集正》卷一，适园丛书本。

②叶昌炽：《藏书记事诗》，北京燕山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544页。

③赵定邦：《（同治）长兴县志》卷二十三下，清同治修光绪增补本。

④臧寿恭：《春秋左氏古义》叙，清同治光绪间吴县潘氏京师刊本。

毕,方治他书,手校书籍极多,必彻终始。光绪元年,卒,年八十有二。所著书四十七种,凡一百三十六卷,其已刊者为颐志斋丛书。可谓精勤矣。此书第一册记周、鲁,第二册记郑、卫、齐,第三册记宋、秦、晋,第四册记晋、楚、吴、越、曹、虞、虢、纪、邾、陈、梁、许、潞。《总目》后有《纂要》,列周十二王、鲁十二公、鲁三桓、晋八卿、郑七穆、春秋五始等,后有《例言》。即丁谓所谓“分国系年,颇有条理”者。因感“小国如滕、薛、杞、莒皆略之”,故于卷十八末手抄“滕、薛、杞”三国渊源附后。

**十一、左氏蒙求一卷,元吴化龙撰,清同治三年刘履芬抄本,
清刘履芬跋,索书号 14684**

同治甲子七月钞。江山刘履芬记。

吴化龙《左氏蒙求》一卷,朱彝尊以为佚而此间有刊本行焉。第其每句夹注某公某年者,恐系后人所搀,然是册原不过供童蒙之求,故姑存以便检寻。刊本改题曰《左传比事》,今复其旧名。化龙,元人,以为明人者,误。庚申涂月,五簃天瀑识。

同治癸亥,仲宣漕帅购得钞本佚存丛书,是阮文达公旧藏本。逾岁,从漕帅假录《文馆词林》、《左氏蒙求》两种,并检《百三名家集》,用紫笔校其同异,弃诸篋衍。丁卯新春,来吴门待缺,见唐蕉庵司马有是书原刊本,辄用朱笔对勘一周,亦有钞本不误而原刊本转讹者,亦一一注于篇侧。天瀑原跋称校书之难风庭扫叶,又述古人之言云读书耐讹字,校订诚不易哉,二月初四日灯下履芬记。

天瀑谓朱彝尊以为此书佚,乃指《经义考》卷一百八十一著录“《左氏蒙求》,宋志二卷,未见”^①,卷一百九十四著录“吴氏(化龙)《左氏蒙求》,佚”^②。并谓此书原供童蒙之求,元戴表元《剡源集》早已言及此说:“盖尝取义类对偶之相洽者,韵为蒙求,以便学者。”^③戴表元与吴化龙早年相识,识之甚深,言及吴化龙深于《左传》,诚不虚也。

此书卷首首行顶格书“左氏蒙求序”,下署“戴表元撰”,序末落款“右序从朱锡鬯《经义考》录补庚申钞冬月吉天瀑”。正文首行顶格题“左氏蒙求”,下署“元吴化龙撰”。无边框,半叶十行。此书卷首有天瀑墨跋。天瀑山人即日本人林衡之号,辑中国久佚古籍 17 种,一百十一卷,即《古佚丛书》,日本宽政至文化间(清嘉庆间)有活字印本,时颇受中国学者重视,阮元选取 10 种刻入《宛委别藏》。跋中唐蕉庵即唐翰题。卷末跋为刘履芬墨笔跋。跋中所及仲宣即吴棠,号棣华,安徽盱眙人。

①朱彝尊:《经义考》,第 932 页。

②朱彝尊:《经义考》,第 9969 页。

③戴表元:《剡源集》卷七序,四部丛刊景明本。

十三、春秋传注三十六卷提纲一卷,清严启隆撰,清康熙四十一年
朱彝尊家抄本,朱彝尊跋,索书号 5938

《春秋传注》三十六卷,乌程县学生严启隆尔泰著。尔泰名在复社,甲申后遁迹,自称“巛𦣻子”,始为是书示学徒,以胡氏为非,而不致尽攻其谬,钱尚书受之遗之书,劝其改作。此编成,庶几起《膏肓》而针《废疾》矣。康熙戊子二月竹垞老人抄竟,因书其略。

严启隆为明朝遗民,入清后隐遁。卷首有朱彝尊墨笔题跋,跋中言严启隆并不赞同胡安国的《春秋传》,但也不尽数攻讦。钱谦益看过此书,劝其修改。跋中《膏肓》、《废疾》即《左氏膏肓》和《谷梁废疾》,用郑玄与何休论战之典故:“时任城何休好《公羊》学,遂著《公羊墨守》、《左氏膏肓》、《谷梁废疾》。玄乃发《墨守》,针《膏肓》,起《废疾》。休见而叹曰:‘康成人吾室,操吾戈以伐我乎!’”朱彝尊以郑玄“针《膏肓》,起《废疾》”之事比严书,实因此书主旨特出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谓:“其意盖深厌说《春秋》者之穿凿,欲一扫而空之,而不知矫枉过直,反自流于偏驳也。”^①

此书9行17字,无格,跋后有朱文方印“竹垞老人”。书中另钤有朱文方印“曾经东山柳蓉邨过眼印”、朱文长印“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”、朱文方印“牧翁蒙叟”、朱文方印“钱印谦益”,可见经钱谦益、刘承幹、柳蓉邨收藏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国家图书馆

^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三一。